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5.007

自然语境下拜厄特《孩子们的书》中的 艺术“制造”书写

姚成贺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在《孩子们的书》中,拜厄特以批评家理性的方式讨论艺术“制造”性的本体意义,在自然语境中挖掘艺术与死亡的关联,以及艺术与生命的交织。小说围绕“制造”的两方面含义——机器制造与虚构捏造——的隐喻展开,除了延续早期创作中虚构侵蚀现实的主题以及由此造成的身份困境,拜厄特还描述了新艺术设计与陶艺创作的自然语境与生命主题。小说中的自然既是拜厄特故事书写的语境,也为读者提供解读人物命运、思考艺术与死亡伦理问题的新视角。

关键词:A. S. 拜厄特;《孩子们的书》;制造;自然;艺术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5-0055-06

英国当代小说家、批评家拜厄特(A. S. Byatt)在早期的小说创作中关注虚构的危险性,认为叙事中强行加入想象的力量会令故事混杂失真,虚构毗邻谎言并侵蚀现实,令后者面目全非、无从辨认。在《孩子们的书》(*The Children's Book*, 2009)中,拜厄特直接刻画了艺术作品与生命的紧密关联。这部颇具维多利亚特色的小说包含以童书作家恩斯比(E. Nesbit)为原型的奥丽芙领衔的威尔伍德家、以陶艺师本尼迪克特为首的艺术家庭、以单亲父亲凯恩上校管理的伦敦博物馆之家为核心的一系列艺术活动,与之相伴的是关于人与自然、艺术与生命关系的反思。斯特罗克(June Sturrock)将《孩子们的书》与默多克的《好徒弟》进行互文解读,认为本尼迪克特与其他父母一样滥用了自己的职权,家庭与社会环境危险重重^①。哈德利(Louisa Hadley)则回应认为拜厄特在小说中强调了艺术家的性别差异,延续了早期作品对于女性艺术家身份困境的关注^②。实

际上,拜厄特将艺术与生命置于自然的语境之中,自然既是拜厄特书写关于“制造”故事的语境,也为读者提供解读人物命运、思考艺术与死亡伦理问题的新视角。

“制造”(manufacture)一词包括两方面含义:机器制造与虚构捏造。在机器的帮助下,19世纪晚期的英国社会大量开采煤矿,为以伦敦为首的工业城市维持繁华景象提供动力。拜厄特曾表示:制造等同于杀戮^③。源源不断的动力以被埋葬的矿工为代价,这个层面的“制造”无异于杀人机器。另一方面,制造又意指艺术作品的塑造,尤其是“手工”形式的塑形或写作,包括小说中维多利亚风格的服饰设计、陶艺家制作瓷器、童书作家撰写故事、战争亲历者写就诗篇。拜厄特将“制造”的两方面含义相结合,讲述艺术创作不惜牺牲一切生命,踏着死者的尸体铸就价值的过程。艺术越精致,就越明显地取决于创作过程中死者的身体或灵魂的存在。小说围绕“制造”的隐喻

收稿日期:2022-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289);北京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20NTSS09)

作者简介:姚成贺(1981—),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西方文论研究。

^①Sturrock, June. "Artists as Parents in A. S. Byatt's *The Children's Book* and Iris Murdoch's *The Good Apprentice*," *Connotations*, Vol. 20. 1 (2010/2011): 113.

^②Hadley, Louisa. "Artists as Mothers: A Response to June Sturrock," *Connotations*, Vol. 22. 1 (2012/2013): 148.

^③Stetz, Margaret D. "Enrobed and Encased: Dying for Art in A.S. Byatt's *The Children's Book*," *Journal of Victorian Culture*, 2012 (3): 90.

展开,除了延续早期创作虚构侵蚀现实的主题以及由此造成的身份困境,拜厄特还描述了师法自然的服饰设计对动植物的杀戮;陶艺家利用土地与尸体结合而成的原料塑造出非凡的艺术作品。自然为拜厄特提供了重新审视艺术与死亡伦理问题的语境,她以批评家理性的方式讨论艺术“制造”性的本体意义,在自然语境中探讨艺术作品与生命的交织。

一 新艺术运动:师法自然的“制造”

《孩子们的书》故事发生于1895年至1910年间,正是欧洲“新艺术运动”(L'Art Nouveau)如火如荼之时。艺术家们试图将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平面设计及手工艺等视觉艺术的各个方面与自然形式融为一体,逐渐形成一种“整体艺术”的哲学思潮^①。新艺术运动还强调手工艺,反对工业化;同时肯定机器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鼓励艺术与工业技术的结合。这些理念都延续了莫里斯(William Morris)倡导的“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之风气。“新艺术”本是巴黎一家画廊的名称,由出版商齐格弗里德·宾(Siegfried Bing)于1895年12月创立,主要展示当时主流设计师的彩绘玻璃、艺术玻璃、招贴画和珠宝首饰等设计作品,这正是在仿效莫里斯设计事务所的基础上开设的。

莫里斯的艺术设计、对工业化生产的批判、社会主义演讲、对英国自然田园的热爱贯穿《孩子们的书》整部小说。拜厄特于2016年出版《孔雀与藤蔓》(*Peacock & Vine: On William Morris and Mariano Fortuny*),讲述他的自然情结。除了幼时对“树林、溪水、野花以及石头和水流外形”的兴趣之外^②,拉斐尔前派与唯美主义的理念更激发了莫里斯选择自然作为艺术的表现形式——既有文学作品中的自然主义形象,也包括墙纸的图案设计。拉斐尔前派成员们始终认为,他们“应该走进自然,并运用文字去描述她”^③。自然之美超

越一切人类艺术家的表现力,拥有无法复制的美——罗斯金(John Ruskin)的这一观点深深影响了莫里斯对美的定义。在莫里斯心中,美与自然存在必然的联系,“美”的标准来自自然,自然规律即美的规律,“人们所制造的一切东西都拥有一种形式,要么是美丽的,要么是丑陋的;如果它依循自然,就是美丽的,而且促进自然的发展,如果它违背自然,就是丑陋的,而且阻碍自然的发展”^④。可见,莫里斯关于美的观念充满强烈的自然主义意味,以及对于自然环境的崇敬态度。在这样的传统影响之下,从自然界寻求灵感成为“新艺术”风格最为突出的特点。新艺术运动多以花卉和昆虫为题材,造型夸张、色彩艳丽,突出表现曲线和有机形态。除了平面图案,珠宝设计和服饰设计也常常以蝴蝶、飞蛾、蜻蜓等昆虫为主题,以展示自然之美。

莫里斯关于自然与美的理念和新艺术的自然风格深深影响了拜厄特。她也曾深入思考过拉斐尔前派的艺术特征,注意到他们“特别着墨于细节描画”^⑤,讲求每一片花瓣、每一根发丝都栩栩如生,如罗斯金所言:“即使最微小的细节也来源于自然,并且只来源于自然。”^⑥在小说创作中,她将这种特征转化为“作者内心深处时断时续地,迷官般复杂地显明”,同时“堆积精确的视觉细节”^⑦。19世纪女性昆虫般的着装常常出现在她的作品中,从女佣到黑蚂蚁和穿制服的工蜂,从身着晚礼服的女士到色彩艳丽的蝴蝶。例如中篇小说《蝴蝶尤金妮娅》,故事情节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宴会厅开启,女孩们用植物和花朵打扮自己,愈发像蝴蝶在花园中飞舞,尤金尼亚“胸部有一束紫罗兰,腰部还有更多的紫罗兰,紫罗兰和常春藤在光滑的金色头上编织成环”^⑧,描画了一幅曼妙的花园意象。《孩子们的书》女主人公、童书作家奥丽芙的服饰也展现了新艺术运动的风格:“帽子边缘缀满黑色的羽毛和繁复的鲜红色丝绸罌粟花”;“薄纱般的披风,上面的纹路如昆虫的

①Stewart, Jack. "Art Nouveau and Interarts in A. S. Byatt's *The Children's Book*," Ed. Rüdiger Ahrens, Florian Kläger and Klaus Stierstorfer. *Symbolism* 2019.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2019, pp. 265-292.

②Byatt, A. S. *Peacock & Vine: On William Morris and Mariano Fortun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6, p. 108.

③Macdonald, Bradley J. "William Morris and the Vision of Ecosocialism," *Contemporary Justice Review*, vol. 7, no. 3, Sept. 2004: 295.

④Morris, William. "The Lesser Arts." (1877) In M. Morris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 22).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10, pp. 3-27.

⑤Byatt, A. S. *Portraits in Fic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Random House, 2001, p. 17.

⑥Byatt, A. S. *Portraits in Fic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Random House, 2001, p. 18.

⑦Byatt, A. S. *Portraits in Fic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Random House, 2001, p. 11.

⑧Byatt, A. S. *Angels and Insects*. New York: Vintage, 1994, p. 4.

翅膀。头发上装饰着忍冬花和玫瑰”^①；茶会上，奥丽芙穿着自由牌细麻布茶会裙，乳白的底色上布满野花、矢车菊、罂粟和雏菊^②。蜿蜒流动的线条、鲜活华美的纹彩使服装获得了奇异的生命力，既热情又奔放。自然形式的有机情调与颇具动感的线条纹路令奥丽芙呈现出自然蓬勃的生命力，展现了一位自然女神的形象。

然而，对于自然风格的崇尚、基于自然世界的设计也隐含着死神的降临。为了达到特定的艺术效果与创作风格，新艺术作品的“制造”无法避免攫取他者的生命^③。小说中另一位童书作家梅斯利在关于女性解放的公众演讲中，对女性充满自然装饰物的流行服饰大发感慨，代表了自然风格的对立观点。他认为连衣裙是现代女性腐败的象征，指出女士们周身香气袭人，身穿娇艳的花朵、华贵的羽毛和皮毛，都是攫取其他生物生命的结果。穿戴华服的女性像孔雀或雄性天堂鸟般艳丽，却成了为逝去生命所萦绕的死亡女神。女性身陷自己亲手制作的棺材里，造成了自身的异化和被奴役状态。梅斯利的作品《自然母亲睡前童谣精选集》中更收录了大量与动物相关的带有“邪恶本质”的短诗，“写出了世界的真面目”，残酷无情却遵循着自然之法。奥丽芙与梅斯利仿佛自然中光明与黑暗的正反面，相互对立却又同生共息。梅斯利理解写作被打断时那种“血液凝滞般的不快”，令奥丽芙感动不已，因为“几乎没有人能理解那种句子的墨水细线被掐断之后何等痛苦”^④。二人的惺惺相惜暗示了奥丽芙对孩子们生命的攫取，以及艺术创作与生命杀戮的难解难解。

艺术设计与死亡的关联更为直接地体现在琥珀饰品的“制造”上。琥珀源于质感软黏的树脂，将动植物的尸体包裹其中，它的美和价值来自瞬间消逝的生命。奥丽芙的童话作品被搬上舞台，丈夫汉弗莱送来一串琥珀珠子作为首演之夜的礼物。珠子由昆虫的尸体装饰，“一个是带花边翅膀的苍蝇，好像存在了几百万年之久，坚硬、透明

的珠子上留下挣扎着逃脱树脂的痕迹”^⑤，将观赏者带回这件首饰最初杀戮昆虫的时刻，包裹着昆虫尸体的树脂经历漫长岁月之后被赋予了美感与价值。新艺术风格的设计往往将动植物的动态形象凝固为静物，攫取它们的精神乃至生命，而这正是故事发生时的时代风尚。

二 陶瓷艺术：土地尸骨的“制造”

来自自然世界的设计要么像琥珀一样包裹着尸体，要么直接踏着死尸的坟墓勾勒出艺术的轮廓。陶瓷艺术作品也“制造”于生命之上。小说开篇，当奥丽芙参观凯恩少校的客厅，欣赏16世纪陶艺大师伯纳德·帕里西(Bernard Palissy)的陶瓷浅盘时，看到里面栩栩如生的蟾蜍、蛇、甲虫、龙虾以及青苔和蕨类植物，甚至据说“这些陶瓷动物里面包裹着真实的动物——真实的蟾蜍、泥鳅和甲虫”^⑥，两人推测该作品无与伦比之美之起源正是死亡。同样，小说中的陶艺家本尼迪克特的两只瓷盘作品上都有“盘绕纠缠的云灰色图案，一个小动物正透过这如烟雾一般的网抬头张望。……面目狰狞，作咆哮状，散发着勃勃生气”^⑦。瓷器艺术也力争将动态形象凝固为静物，其生命力首先来自创作的原材料。初次面对本尼迪克特的作品时，年轻的助手菲利普看到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红色。墓地泥土与尸体的结合，使原本普通的黏土拥有了美学特质，呈现出一种麻袋状的、微红的状态，这成为陶瓷的创作原料。在陶艺家手中，由凡人遗骸构成的黏土被塑造为非凡的新形式。帕里西与本尼迪克特的艺术作品在形式上都体现了新艺术运动的自然风格，却令艺术家为死亡的意象和造物所团团包围，双手沾满血腥。

1900年前后，死亡是德语文学中的核心主题之一，“德国人爱死亡，您看看他们的文学，其实他们只爱死亡”^⑧，小说刻意强化了这一背景。故事中的戏剧导演奥古斯特斯·思坦宁对德国新戏剧、民间传说和奇幻故事颇感兴趣，由他编导的德

①拜厄特：《孩子们的书》，杨向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2页。（下文引自谈著作的不再另行标注。）

②拜厄特：《孩子们的书》，杨向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87页。

③史锡哲：《自由与生命关系的哲学透视——兼论生命自由论的当代建构》，《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④拜厄特：《孩子们的书》，杨向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23页。

⑤拜厄特：《孩子们的书》，杨向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630页。

⑥拜厄特：《孩子们的书》，杨向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4页。

⑦拜厄特：《孩子们的书》，杨向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30页。

⑧方维规：《“病是精神”或“精神是病”——托马斯·曼论艺术与疾病和死亡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国版童话木偶剧《灰姑娘》始于葬礼,第一幕就是一列送葬队伍和着缓慢的鼓点穿过舞台:身穿黑衣的送葬者抬着一口棺材,鰥夫伤心欲绝,女儿穿着黑衣,在忧伤的鼓点中是棺材、绿色土包和墓碑等构成的充满死亡意味的情境。不仅如此,木偶剧还直接再现了大量血腥场面:鲜血从金色的鞋子里溢出;傲慢的姐妹眼珠已然不见,只剩下血淋淋的窟窿^①。残忍的场面毫无含蓄保留,令孩子们胆战心惊。欣赏油画《木偶们》时思坦宁告诉观众,“你可以把这位艺术家当作吸血鬼,他从那个可怜的女孩身上吸掉生命力,又转移给木制的胳膊腿和涂画过的脸蛋”;画作“描绘的是真实与想象世界之间的边界。想象世界比真实世界拥有更多生命力,正是艺术家赋予这些人物以生命”^②,道出艺术作品生命力的来源。正是为了获得灵感、赋予艺术作品以生命,本尼迪克特走向大海深处,也走向生命的终结。他相信只有走进海洋深处才能获得灵感,践行了一种为了艺术主动献祭型的死亡,在看见自己死亡的过程中死去。他的尸体失踪不见,只找到一只用黏土裹住的单鞋,颇似一张沾满黏土的面孔。正如被埋葬在坟墓中的尸体,又像被裹在树脂里的苍蝇,作为艺术家的本尼迪克特本人成了那只为琥珀献祭的昆虫。

与此同时,世纪之交的另一大思潮是生命哲学,宣扬“生命即最高存在原则”^③,体现在人物对自然的态度上。小说在描写德语文学充满死亡气息的血腥文字的同时强调德国人对自然的热爱,他们喜欢回归自然,经常徒步旅行去找寻自然,在高山、森林中放歌;白银时代一派亲近自然的精神风貌:人们热爱大地,企盼回归大地,回到湍急的河流旁边,回到莫里斯描绘的遍是田野、农舍花园,缠绕着金银花的乌有乡^④。那些描写英国大地的杰出大师们也写下自然世界里各种美妙景观。然而,“大自然不会在绚丽的织锦上表现大地……她的世界是黄铜色的,而诗人只会传达一种金黄色”^⑤。如果说艺术家通过“制造”赋予想象世界以生命,那么自然则超越于艺术之上。对

死亡的偏爱和对生命的颂扬正如自然这个“矛盾女神”,但与自然的神秘广博、生机勃勃之美相比,人类艺术家的“制造”无疑要逊色一筹。

成长为新一代陶艺家的菲利普也来自充满死亡阴影的世界——最初被人们发现时,他住在地下幽暗的“墓穴”或称“神龛”里。尽管如此,菲利普却更接近于“自然之子”。他厌恶城市里的滚滚浓烟,伦敦令他肺部紧张且过度膨胀,感觉到渗透进内脏里的肮脏。他喜欢的是与大地、泥土融为一体,“躺在那股难闻又迷人的气味中,让自己的肌肉一点点放松,地面托着他柔软的身体,他能感觉到所有那些粗糙不平的东西:东倒西歪的植物茎秆、树木带瘤结的根须、石子以及身下冰凉的土壤”^⑥。夺走本尼迪克特生命的大海,在菲利普面前则平静地涌动,一波接一波地浸泡着沙地。他从内心深处感受着浩瀚的水域,感受着身心无法言说的剧变。菲利普还期望通过观赏赋予石头某种形式的生命,把人类与看似没有人性的石头联系起来,这种本能正是来自与土地的联结。对自然的亲近与接近本能让菲利普在后来的陶艺创作中,对基于自然形状的几何结构和几何形式的设计原理兴趣渐浓。从一战战场归来,他使用同伴留下来的沾满血腥的红色土壤作为艺术创造的原材料,让那些已故之人的尸骸有机会被粉碎、重塑,回归泥土、大地,得到重生。骨头与血网搅动混合在一起,生成浓密的红色泥湖,既掩盖了尸骨,也成为创作陶瓷艺术品的理想材料。在艺术家的“制造”中,死亡孕育着新的生命形式,呼应着世纪之交艺术的死亡主题与生命哲学。

三 童书创作:主体身份的“制造”

受到父亲去世的影响,拜厄特重新思考生存、死亡、家庭、时间的问题。她未能找到理解父亲死亡的合适方式,而是利用了亲人的死,醉心于想象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以思考真实与写作的本质问题。正如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看法:外部世界是无生命客体的幻影,只有诗人的知性才能赋予外部世界以活力,亦即具有柯勒律治所说的

①拜厄特:《孩子们的书》,杨向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61—64页。

②拜厄特:《孩子们的书》,杨向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95页。

③方维规:“病是精神”或“精神是病”——托马斯·曼论艺术与疾病和死亡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④拜厄特:《孩子们的书》,杨向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469页。

⑤拜厄特:《孩子们的书》,杨向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495页。

⑥拜厄特:《孩子们的书》,杨向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35页。

“理想世界的深度和高度”^①。无论真实世界中的人物生或死,都须经作家之手方能成为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形象。《孩子们的书》中的奥丽芙正是这样一位将事实从回忆发展为形象的童书作家。她以孩子们的真实经历为蓝本,分别探索不同想象世界的脉络,为每个孩子写下一本特别的故事书。以书写的形式,奥丽芙将孩子们的精神或灵魂注入故事,语言模糊了虚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界线,成为自己身份建构的路径。写给汤姆的故事以及据此改编的舞台剧将后者的秘密公之于众,虚构与现实界线的模糊造成汤姆身份认知的困境;自然世界的崩塌又导致环境身份被破坏,汤姆最终走向生命的终结。

写给汤姆的故事题为《汤姆地下世界历险记》,故事主线是主人公在黑暗世界中寻找儿时被偷走的影子。随着情节的不断丰富,汤姆已然沉浸在虚构的故事中难以自拔。阅读自己故事时的汤姆才是真实的;在寄宿学校里躲避同学目光的汤姆则成为上了发条的玩偶。正如史蒂文森(Benjamin Stevens)所指出,小说中人物的生命如同行尸走肉,描述了一场走向地下世界(underground)的旅程^②。汤姆是这个故事的生命,或者说故事占有了他的生命,令他不得不走向地下世界。最终,奥丽芙将汤姆视为生命的个人故事搬上舞台,给了他致命一击。奥丽芙并非为了孩子们的乐趣而创作,而是为了自己可以随意翻阅书中内容以获取作品创作的原材料,她所期待的读者也绝不仅仅是汤姆或任何一个孩子。自然女神此时化身为吸血鬼式的巫婆形象——姐姐维奥莉特的猝死令奥丽芙只遗憾这个事件不能写成一部小说,初次见到艾尔西,奥丽芙也琢磨是否可以拿这件事写个好故事。奥丽芙“身上流露出某种巫婆的怪异”^③,随时准备牺牲或利用周围人的生命。

有学者据此认为拜厄特的兴趣在于“杀死他人作为艺术活动根源的必要性,以及这种残酷的必要性给艺术家和观众带来的道德困境”^④。这其实也是一直困扰拜厄特的难题:“我不明白为什么写作总是危险的行为,为什么作家最后都成了破坏者。”^⑤奥丽芙的写作触碰了危险的底线,但她才是真正不断面对死亡恐惧的人。在她的内心深处,激荡着逃离北方贫困生活的记忆。父亲、兄弟为了开采煤矿给伦敦提供动力而先后丧命,以至于后来枝繁叶茂的大家庭和文字幻想世界都在“反对和怨恨生活在灰坑、煤渣、隆隆的地下恐怖和到处散落的黑尘”。奥丽芙疲惫至极,即便处于孕育着新生命的阶段,却仍会想到苍白的死胎和无知无觉的脸蛋。战争中,身边最亲近的人接连逝去,悲剧变得如此常见,她不得不时刻面对死亡突然降临的恐惧。战争更像一把切碎世界的刀,“世界就像一块奶酪,或者屠夫的肉”^⑥。朱利安感慨:“诗歌是人们被死亡、死亡的存在,对死亡的恐惧,或者他人的死亡逼出来的东西。”^⑦所谓的文明、进步带来地下世界的阴晦无光,带来摧毁一切的战争,奥丽芙只得完全沉浸于虚构的世界中,在那里塞满各种角色和物品,从人类想象和长久历史积累起来的财富中汲取能量。故事是能量的来源,维系了一切,却令奥丽芙陷入复杂的虚构世界里难以脱身。不仅是汤姆的秘密,奥丽芙也把隐秘的自我公之于众。

汤姆的死同样源于文明、进步造成的自然世界的崩塌和环境身份的缺失。利科(Paul Ricoeur)的“环境身份”概念指出,身份的基本方面也即人们理想中的生活,而环境提供给人类主体得以认识自身的语境,扮演着建设性与批判性的角色^⑧。贝尔(Nathan M. Bell)进一步将环境身份定义为个人对与环境理解辩证相关的自我认识,包括对于人类与非人类的环境以及整个自然

①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第二版)》,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②Stevens, Benjamin Eldon. “Virgilian Underworlds in A. S. Byatt’s *The Children’s Book*,” *Classical Receptions Journal*, vol. 8, no. 4, Oct. 2016: 529.

③拜厄特:《孩子们的书》,杨向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94页。

④Stetz, Margaret D. “Enrobed and Encased: Dying for Art in A.S. Byatt’s *The Children’s Book*,” *Journal of Victorian Culture*, 2012 (3): 89.

⑤Sturrock, June. “Artists as Parents in A. S. Byatt’s *The Children’s Book* and Iris Murdoch’s *The Good Apprentice*,” *Connotations*, Vol. 20. 1 (2010/2011): 113.

⑥拜厄特:《孩子们的书》,杨向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05页。

⑦拜厄特:《孩子们的书》,杨向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649页。

⑧Bell, Nathan M. “Environmental Hermeneutics with and for Others: Ricoeur’s Ethics and the Ecological Self,” Eds. F. Clingerman et al. *Interpreting Nature: An Emerging Field of Environmental Hermeneutic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41-2.

环境的理解^①。这意味着对自然环境的理解同主体的自我认知密切相关。每个人都拥有环境身份,无论是关怀、冷漠或对抗自然世界。汤姆喜爱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他喜欢“那些声音,那些树木,那些动物,那些吱吱声,来来往往的风声”^②。除了与自然世界的直接接触,他贪婪地阅读莫里斯的浪漫传奇:《世界尽头之井》《世界之外的树林》以及《乌有乡消息》,住在小石屋里理想化的快乐工匠,蔬菜、鲜花、藤蔓和蜂蜜的绚丽多彩是他心之向往^③。博物学家对英国大地的神秘主义、达尔文有关自然选择的观点,都像树屋一样构成了汤姆的主体身份。当象征美好童年的树屋被砍伐时,汤姆亲眼见证曾经是自己身体和身份一部分的树屋变成废墟。

对自然毫无保留的热爱、与自然的过度融合暗含着危机。卡尔维诺在《树上的男爵》中礼赞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就曾表达对于二者过度融合的担忧^④。正如他笔下终身与树相伴的柯西莫,与自然相融的汤姆在工业车轮的碾压下不可避免走向悲剧结局。汤姆与奥丽芙的身份困境追根溯源,都与工业进程以及自然环境的破坏相关。人类无法生存于缺失自然的环境,环境身份是主

体不可或缺的属性。奥丽芙在童话创作的虚构世界里汲取能量,而失去自然保护伞,又不得不将生命注入虚构故事中的汤姆则失去了所有的庇护。

结语

艺术作品的构建必须以有机材料为基础,因此,它常常在他者死亡时生机勃勃。这既是艺术家无法绕过的真理,也是他们焦虑的来源。艺术家似乎偏爱病患与死亡,实际上,对于死亡的兴趣正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与熟知、对于自然的亲近与崇敬。对疾病和死亡的兴趣,可以说是对自然与生命之兴趣的一种表现方式。拜厄特将艺术与死亡置于自然世界的广阔领域中,死亡为了“制造”,从死亡到艺术发生的是生命形式的转化。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转化所形成的构成物才具有真实的存在,这时某物完全地变成了另外一物,这另外一物作为被转化成的东西则代替了原来的某物而成为真正的存在,“这种转化是向真实事物的转化”^⑤。而生命的消逝正是这样一种抛弃原有存在、产生新存在的转化过程,它在一瞬间发生了整体突变,在艺术作品的“制造”中回转为真实的存在。

“Manufacture” Art of A. S. Byatt's *The Children's Book* in the Context of Nature

YAO Cheng-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The Children's Book*, A. S. Byatt explores the ontological meaning of the “manufacture” of art work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death, as well as the interweaving of art and life from a literary-critical perspective. The novel revolves around the conception of “manufacture”, namely, machine manufacturing and fictional fabric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theme that fiction erodes reality which results in identity dilemma in her early writings, Byatt describes the theme of life of L'Art Nouveau style and pottery cre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ature. Thus, nature in the novel is not only the context of Byatt's story, but also a perspective for readers to reflect the life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ethical issue of art and death.

Key words: A. S. Byatt; *The Children's Book*; manufacture; nature; art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Bell, Nathan M. “Environmental Hermeneutics with and for Others: Ricoeur's Ethics and the Ecological Self,” Eds. F. Clingerman et al. *Interpreting Nature: An Emerging Field of Environmental Hermeneutic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41.

^②拜厄特:《孩子们的书》,杨向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567页。

^③拜厄特:《孩子们的书》,杨向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82页。

^④王芳实:《人与自然的距离:〈树上的男爵〉中的生态意识》,《当代外国文学》2021年第1期。

^⑤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1)》,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57页。